

FOUDING DE
XIANDAIXING

否定的现代性

——理解阿多诺

◆
陈胜云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陈胜云 著

FOUDING DE XIANDAI XING

否定的现代性

——
理解阿多诺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否定的现代性:理解阿多诺/陈胜云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12
ISBN 7-226-03165-5

I. 否... II. 陈... III. 阿多诺, T. W. (1903~1969)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1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1798号

责任编辑:胡福生

封面设计:陈珂

否定的现代性:理解阿多诺

陈胜云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245 千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6-03165-5 定价: 28.00 元

导论:走入现代性

本书所研究的是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rno, 1903.9-1969.8)的社会批判理论。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就如本书所论证的,阿多诺的理论确实是从现代性理论范式到后现代理论范式这一过渡的转折点;从理论内容来看,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可以被理解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西方思潮之间展开的颇有建树的理论对话。

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来看,有关阿多诺生平、著作情况的介绍颇多,因此,本书不准备重复,而是希望基于国内外学界对阿多诺思想的新近研究,循着阿多诺本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其学术思想展开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解。

纵观国内外学界对阿多诺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研究在不断地深入:从一般介绍性的书到现今从不同视角展开深度阐释的专著,都已经与有关现代性、后现代以及全球化的讨论主题相关联,这不仅拓宽了解阿多诺本人学术思想的理论视野,同时,也为我们经由阿多诺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见解走入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之现实语境提供了理论切入口。

我们之所以把阿多诺理论与现代性联系起来,首要原因在于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本身的主旨就是消解那种把理性设定为取之不尽的知识来源,并以此遮蔽人对自然、人对人现实奴役的现代性理论的。现代性不是单维度的现实或理论,严格说来,它涉及的是

一组现实与理论范式。当我们把论题延伸到后现代和全球话语时，现代性的意蕴就更为丰富了：后现代理论真的颠覆了现代性范式吗？现代性可以在全球时代延续自己的规划使命吗？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轻描淡写地得出结论是不合适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现代性本身作出论阙的限定。从这个角度看，阿多诺是深刻的，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可以在现象这个层面描写现代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哲学层面对现代性问题加以深入的剖析。理性不等于现代性，因为人类发展始终需要理性来引导；而现代性涉及的是理性具体的展开形式，有时候它以非理性的形式出现。基于传统理性范式的现代性之所以受到后现代理论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意欲消解这种理性的非理性后果。

后现代是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常常以价值维度本身的消解为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催生了人们对现代性规划的留恋：现代性规划终结了吗？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反思现代性的时候，转换理论视角也许比较轻易地抛弃现代性更为合理。由此，“反思的现代性”成了后现代思潮之后最为流行的话语之一，同时，这种现代性话语又与全球话语结合在一起，使自己获得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意义上，或许，称阿多诺手中所搬弄的现代性为传统的现代性更为合适，因为，显然，阿多诺并没有谈及反思的现代性，虽然他对现代性的反思不亚于任何一位当代学者。把阿多诺与全球话语联系起来，表面看起来有些牵强，实则不然，这里的关键在于体认阿多诺在反思现代性之后主张的价值重建这一理论维度：作为人类，我们无路可逃，现代性规划的具体样式可以扬弃，但现代性规划本身却是人类进步所无法逃离的，我们的唯一选择是走入一个被反思所监控的新话语时代。

本书讨论的基本立场依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我们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系：对现代性的批判在多大程度

上损害了历史辩证法的合理形象?后现代理论真的为重建历史辩证法提供了前提吗?历史辩证法在全球话语时代真的过时了吗?阿多诺的理论对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否定性思路,这一思路在阿多诺理论的批评者那里得到了肯定性延伸,正是这种理论相继性为我们丰富与发展历史辩证法提供了新的视角。

因为阿多诺是从多角度来展开和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因此,我们的考察是以阿多诺的整体批判理论为对象,这里不仅涉及哲学理论批判,也关涉到文化、美学等领域。那么,我们先从阿多诺对现代性的理解开始我们的理论叙述吧,为此,我们不得不回到晦涩的德国哲学。

一、奥德修斯:现代性的原初形象

阿多诺是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发现现代性的原形的,这里说的是奥德修斯经过塞壬岛的故事。奥德修斯是众神之父宙斯从头中生出来的,他是充满智慧和知识的女神雅典娜·帕拉斯的宠儿,在神话中,他也是人类智慧的象征。阿多诺认为,希腊之神奥德修斯是人类的符号,他的个体经验集中反映了人类支配自然之后又回过头来奴役人类本身这一主体历程。阿多诺对奥德修斯经过塞壬岛的故事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把塞壬仙女们的美妙歌声类比为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力量,而把划船手当作被奴役者压迫的人们:

当船即将使到塞壬岛时,奥德修斯就对划桨手们说:“朋友们!现在我们要经过塞壬仙女们的岛了。她们以美妙的歌声诱惑经过的水手们,并且将他们残暴地杀死。岛上到处都布满被她们杀死的人们的白骨。我用蜡封住你们的耳朵,使你们听不到她们的歌声,免得去送死,你们把我绑到船桅杆上,因为女巫基尔克让我听塞壬仙女的歌唱。如果我被她们的歌声所迷惑,而要求你们放开我时,你们就把我捆绑得更紧些。”于是奥德修斯用蜡封住了划桨手的耳

朵，而划桨手把奥德修斯也紧紧地捆绑在船桅杆上，并且是“没有一个关节能够活动”。这里请注意，奥德修斯并没有让同伴把他的耳朵给封上，因为他想听塞壬仙女们那迷人的歌声：“噢，伟大的奥德修斯！/把船驶到我们这里来吧！/来欣赏我们的美妙的歌声吧！/从来还没有一个水手，/不聆听我们甜蜜的歌声。/听完歌曲再离开我们，/你会洞晓世上的许多事情。/我们知道众神使希腊人在特洛伊所受的苦难和世上发生的一切事情。”^①奥德修斯听入了迷，示意伙伴们给他松绑，但同伴们牢记他的交代，把他捆绑得更紧，只有在他们的船走得看不见塞壬岛的时候，他的同伴们才从自己的耳朵里取出蜡并从桅杆上解开了奥德修斯。就这样，他们安全地经过了塞壬岛。

在这儿，借着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奥德修斯既成功地听到了仙女们动听的歌声，又保全了自己的身体。在此，阿多诺看到了以理性为工具来克服自然威胁并对自然力进行支配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以及理性的原形：面对着仙女们的诱惑，利用把自己的身体捆在桅杆上的策略，既实现了自我保存，同时，这又是以对他人的非理性压抑为前提的，即强制性地用蜡封住划船手的耳朵。

我们看到，奥德修斯战胜塞壬之歌两种必要性选择的结合表证着启蒙的初始地平，一种必要性选择是用蜡堵住同伴们的耳朵，要求他们竭尽全力地划桨；另一种可能性选择是让同伴们把自己牢固地捆在船桅杆上，然后再聆听美妙的歌声。这里暗示了人对自然的支配和人对人的支配在自我维持的启蒙过程中的统一性。奥德修斯对自然的支配不过是自然暴力的内在化，最后它必然地爆发出来，这种暴力的对象不再是自然是人类，奥德修斯最后要为

^①〔俄〕H·A·库恩著，秋枫、佩芳译：《古希腊的传说和神话》，399~4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自己报仇,他杀死了所有向他的妻子求婚的人,在这里,人本身成了主体要消灭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认为,启蒙重新回到了神话,理性回归于非理性,自由和进步模式作为现代性之特征转变成了统治和倒退。

我们知道,一般地讲,启蒙之前是神话逻辑支配的世界,而在神话的世界里,人们生活的原则是以巫术、宗教原则为指导的。西方的历史表明,打破这种生活原则的是十六世纪的新教运动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启蒙思想家们的预言打破了神话和巫术的权力,为现实社会确立了一种生活的理性原则,这样也就为人类掌握科学技术和支配自然力量创造了基础,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前提。这个过程也就是世界的祛魅和宗教权力的销蚀过程,在此,职业化的专门知识日渐取得支配性地位,同时也带来了工作任务的具体化和劳动分工的增长。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主观理性便开始建构自己了,它没有停留在经济发展领域,而是走得更远。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里,宗教(包括文化的其他形式)与政治结合在一起。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各层次也开始分离开来,而且同样以工具理性的模式实现专门化,于是,艺术、文学、政治、国家机器、法律等以有效性、可计算性的原则确立起来。过去的社会里,社会是以经济之外的方式如宗教来组织的,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社会是以纯经济、工具理性的方式来组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启蒙之后的人类社会过程是一个工具理性的实现过程,它涉及的是韦伯经常谈论的资本主义簿记,一般的计算和科层制。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诠释是沿着韦伯的思路展开的。

在韦伯看来,人类生活的世俗化即对神话的消解和对宗教的脱离与工具合理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把一切现象都当成手段与工具来分析,而并不关心工具之外人类的真正目的。所以,

社会被工具化就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当然韦伯同样也意识到了这种工具化意识给人类文化带来了不少麻烦,即人进入了自己编织的铁笼!

沿此思路,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的头一句话就是:“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过去启蒙的纲领曾经是使世界清醒。启蒙想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启蒙只有给自身以力量的思想,才足以摧毁神话。启蒙给自己什么力量呢?对此,培根有个说明,他认为知识是为了掌握自然界和人,程序的实质是方法,是知识发挥作用的中介。由于程序的介入,人们在研究新的科学时放弃了思维:人们用公式来代替概念用规则和偶然性来代替原因。阿多诺认为,通过这种转换,启蒙思想的概念以及这种思想错综交织在其中的社会的具体的历史形式、机制,已包含了今天到处都表现出来的衰退的萌芽。从理论上讲,“虚假的、含混不清的概念,只不过是神话的另一种表达。”^①所以,在理论上,应该到启蒙本身中去寻找启蒙衰退为神话学的原因。从现实表层看,阿多诺所要做的是通过理论的分析来提醒人们:公众社会的进入使得思想不可避免地变成实证性的了,而语言变成了对这种状况的颂扬;以批判来消解这一切,正是批判理论目的本身。

进一步说,启蒙精神是“用主体的设想来解释自然界”。按启蒙精神看来,许多神话中的形象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来自主体。奥狄浦斯解答了斯芬克斯的谜:“这就是人”。也就是说,启蒙精神把一切异于自己的东西都翻译成主体人的形象。这就是启蒙精神的核心。启蒙精神又是如何表达自己的呢?它是通过统一公理或范

①〔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洪佩郁、简月峰译:《启蒙辩证法》,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式来表达的，其本质是“统一科学的结构”，培根的一般知识假设在多元论的研究领域内是经常被运用的，莱布尼茨的一般规则也常被作为根据。培根认为，在最高原理与观察定理之间，应该有通过普遍性阶段表现出来的清晰的逻辑关系。形式逻辑是统一化的大学校，它为启蒙者提供了预计世界的公式。最后数成了这一逻辑的表现形式，而且，柏拉图在最后的著作中用数表示理念的神秘等式，这说明了希望摆脱一切神话学的愿望：数字成了启蒙的规则。于是，这样一切质的东西都被摧毁了，留下的只有公式与一般性形式。

于是，在现实中，主体的思维缩小为数学公式，“这种公式具有直接的最抽象的形式的中介数字，相反的都坚持了单纯直接性的思想。真正地保持实际的东西，认识局限于重复，思想只是同义反复。”^①由此，思想机器越是从属于存在的东西，它就越是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从而启蒙精神就倒退为神话学，但它也从未想到要摆脱神话学。因为神话学的形式包含了现存事物的精华，它反映了作为真实世界的循环过程、命运和统治，而放弃了希望。所以说启蒙精神回到了神话！

阿多诺认为，思维的同义反复表明主体在制造一致性，这意味着思维像经验一样的贫困；思维和经验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反过来又使这两个领域成为残缺不全的领域。科学按照工具理性化的工作方式对待人们的经验，不再注意它们存在的质的区别而只考虑它们的功效。通过社会的中介，人变成了与社会发展主观理性化程式得以实现的工具，这样一切都反过来了：现实的人变成了单纯的类本质，相互之间同样地经受强制控制的集体性的孤独，社会中具体的劳动

①〔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洪佩郁、简月峰译：《启蒙辩证法》，2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条件迫使人们顺应潮流,对愚弄和歪曲真理的影响不加以抵制。从神话学到逻辑中心的过程,思维本身失去了反思的因素,而今天机器即使供养了人们,它也使人们变得残缺不全。并且,扭曲了的理性以机器的形式对社会发生作用,社会使固定化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工具的思想与自由的活生生的东西协调一致,使思想与作为它实在的主体的社会本身发生关系。现实中,“随着支配自然界威力的增长,社会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猛烈增长,这种荒谬的状况说明了合理社会的理性已经过时。”^①

与启蒙的原初设想相异的是,人没有成为人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的主人,恰恰相反,人成了工具理性的牺牲品,“在受启蒙的世界里,神话学世俗化了。”即什么都成了神话学的样式,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自我都成了模棱两可的了:不仅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体的自我反思性关系也被异化了。通过社会分工的维持,自我生存过程越是扩展,这一过程就越是强烈地迫使按照技术结构塑造自己肉体 and 灵魂的个人,进行自我外化。主体思维逐渐地被取消了,主体萎缩为一种认同直接性的工具:“课堂中通过逻辑思维的证明,认可了工厂和办公室中人的物化。”^②正是启蒙精神对自然进行支配以实施自我维持的功能使得主体思维失去了自主性,所以说,启蒙精神支配了精神本身。

联系神话来说,神话的本质是神对自然的管理与支配,当然,神话中神对自然的管理与支配是虚假的,它通过人这一现实主体

①〔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洪佩郁、简月峰译:《启蒙辩证法》,3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②同上,27页。

以巫术、宗教仪式来实现；而启蒙精神则直接支持了人对自然的真实支配。所以，“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①从启蒙的历史看，无非是把原来由神所占据的位置给了人，就人与自然、事物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来看，人相当于神，这里的区别只是，神只支配自然，而人在支配自然的同时，还支配人，这正是统治！

因此，那种失去控制的理性化过程，最终转化成了一种多层次化、制度化的统治形式。在这种统治形式中，科层精英和科层制度通过宣称他们拥有超凡的知识以及他们的权力体现着理性自身的要求，来为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提供正当理由。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发展至今，所达到的社会表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②

服从于在自然威胁中保卫身体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冲动而支配自然的行为，必然产生出社会性支配，将暴力加害于人的内在自然，即划船手的麻木和奥德修斯自己的行动自由。这样，一方面，支配自然的人类理性对于被支配的自然来说，将作为对象性地客观化的东西而形成，它就是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定型化。同时，作为对自然进行支配的代价而产生的，是社会性支配关系，它从人类支配自然那一刻起便作为“第二自然”而存在了。由此，由工具理性产生的人对人的统治性关系便成为社会的宿命，这种“第二自然”与个人相对立，个人向与这种关系本身的社会主体相对的客体方向沦落。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工具理性的奴役性质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技术性、规律性的支配而遍及、渗透到了管

①〔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洪佩郁、茵月峰译：《启蒙辩证法》，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②同上，113页。

理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正是主体支配的原初形式。正是这种以科学技术为名的工具理性,使人类主体的支配本性日益蔓延,最终导致了二战期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诞生。“奥斯维辛”是阿多诺经常回到那里去的痛苦人生体验,它也是阿多诺分析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焦点。

二、“奥斯威辛”体验与哲学冲动

阿多诺曾多角度分析过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以及法西斯宣传得逞的原因。关于法西斯主义宣传得逞的原因,他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1951年)里指出:“在于希特勒一伙暴乱唤起者‘按照弗洛伊德的揭示来构思的’,是一种心理机制的被利用与实施。”阿多诺从“施虐与受虐狂”的心理机制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程式作了分析,认为正是利用了这一机制,使人们在愿意受上一等级的人虐待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去虐待下一等级和“外群”的人。因此,法西斯主义产生有其内在原因,首先,这里存在的是奴役人这一主体的坏主体,这就是以人性为奴役对象、以人为试验对象的法西斯暴徒;其次,严格说来,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内在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关系,“虽然法西斯主义煽动者无疑利用了他的演说对象的某些倾向,但他是作为强有力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代理人那样做的。”^①

在阿多诺看来,法西斯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的被压抑的神秘的历史复归,或理解为被支配的大自然的报复,这里使用的许多手段正是由于工具理性为了支配自然而发展起来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用来支配自然的手段现在成了法西斯主义得以实施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的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2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暴行的条件，这足以证明，所谓的启蒙进步并不是与它的对立面，即野蛮毫无联系的：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大屠杀是在现代性之内而不是之外发生的，它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反面，都属于现代社会的产物。所以，与阿多诺一样，鲁本斯坦在他的《历史的狡计》里声称：“把文明和野蛮当作对立面是不合适的，今天，野蛮仍然存在，只不过它得到了更为有效的管理而已。”^①

仔细分析起来，“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一个现代工厂，活人从工厂流水线（毒气室等）的一端进去，经过几道工序的加工（受害过程），最后被从浓烟滚滚的烟囱排出。在这里，存在的同样是技术工程师们设计出的基础设施——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出的现代官僚制度体系——纳粹党卫军的上下级关系，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离开现代性的。可以这样说，“奥斯威辛”大屠杀的实施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纳粹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是以“管理与经济厅”来命名的，在这里，“除了其目标在道德上令人厌恶以外，这种行为在任何正式的意义（只可以用官僚制度语言表述的意义）上与‘普通的’管理和经济部门设计、指导和监督的所有其他有组织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区别。”^②

法西斯大屠杀当然不是现代官僚体系和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

^①Richard L.Rubenstein, *The Cunning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78, P91

^②[英]鲍曼著，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1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直接产生的，问题是我们要认识到，工具理性的所谓的科学的原则，它的目的的合法性只是对经济来说才是有效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才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合法性；而对于人的意义、人类目的来讲，现代官僚体系与技术理性同样是淡漠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现代官僚体系和技术理性的貌似合理性促成了法西斯暴行的实现。所以说，在技术理性追求以完美的理性方式来解决日常问题的时候，也显示出能够产生大屠杀式解决方式的能力。

基于工具理性建构起来的现代文明，虽然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一种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传统现代性缺少的正是人性的关怀。就现代官僚制度的理性化模式而言，我们从法西斯主义大屠杀实施中可以体认到这种模式仅仅是对效率的刻板效忠，这种模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劳动分工与命令和信息的上下级传达，人性在它之外。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屠杀实施过程始终是围绕着经济原则，以追求效益为目的来进行的。希特勒只是要求“对犹太人进行清洗”，但并未对方式作出具体规定。于是，我们看到，这一“清洗”目标一作出，便交由下面的技术“专家”（包括经济专家）对各种“清洗”方式进行经济成本分析，原来是准备以迁移方式解决，但后来发现这一方法不够经济，所以，1941年10月便停止了这一方法的实施，而采取了更为经济有效的办法，即从肉体上“最终解决”犹太人。在这里，大屠杀实施过程始终是与技术理性相一致的，它们是在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下采用先进工业技术加以实施的。

谈到法西斯主义，阿多诺一定会回到犹太人的问题上来，因为阿多诺从来都没有忘记犹太身份给自己带来的痛苦经历。阿多诺一直坚持，“排犹问题”只能放在启蒙的辩证法这一广阔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犹太人是工具的合理性的极权主义同化原

则的首要目标，因为他们是西方世界中他性和差异的最坚强的堡垒。”^①

犹太人问题是个经济问题，是现代性问题，当统治者在经济上不再需要犹太人时，犹太人就被确定为他们专制的对象，犹太人不过是他们虐待的对象。统治者的欲望就是完全占有财产，不惜一切代价以掌握无限的权力。他们用犹太人来当自己的替罪羊，犹太人只是现代性的一种牺牲品，是当权者的替罪羊，是所有阴谋诡计中的替罪羊。“资产阶级的反犹太主义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原因，就是想用发展生产掩饰统治权。“当权者”把整个阶级所遭到的经济上的灾难，都加到了犹太人身上。”^②

阿多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走得很远，有时我们都觉得太远了，但或许对一个亲身经历那一段历史的人来说并不过分。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除了引用张峰先生所译书名《否定的辩证法》外，笔者倾向于把“Negative Dialectics”译为“否定辩证法”，所以，在引注张峰先生译书时才用“否定的辩证法”，其他情况一律用“否定辩证法”——笔者注）里把这个问题与抽象的哲学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寻找起源、第一性的哲学是与现实社会中的强制相一致的。“根、起源的范畴是一个统治性的范畴，它证明一个人之所以被列为第一流的，那是因为他在那里是第一流的；它证明本地人反对新来者、定居者反对迁移者。”^③显然，阿多诺在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作为反思的基础，可以看出，其批判理论多么深刻地受到在二战期间移居生活的影响。

①[美]马丁·杰著，胡湘译：《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3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②[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洪佩郁、简月峰译：《启蒙辩证法》，16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③[德]阿多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15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本质地讲，这种把人分为等级，并使一个等级从属于另一等级的做法是与变为神话的启蒙的本质相一致的，因为启蒙需要抽象与同一。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的东西，摧毁了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又在普遍的联系中，在商品交换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启蒙精神，不仅在思想中消除了神秘力量，也去掉了不能统一衡量的一切东西；不仅在思想中消除了质量，而且使人们变成与实在相同。启蒙的抽象与同一并不可能使一切同一，所以，启蒙精神都始终是赞同社会使用强迫手段的。被操纵的集体的统一性就在于否定每个个人的意愿，这是对那种能使被操纵的集体统一的社会嘲讽。显然，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青年组织中出现的乌合之众，并不是倒退到旧的野蛮时期的现象，而是镇压平等的表现，是正义的平等发展为非正义的平等。法西斯主义的神话暴露出自己是史前时期的真正神话，因为真正的神话体现出了对自然的报复，而虚假的神话盲目地把这种报复体现在祭祀上。所以说，“通过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变成可以重复的抽象，以及抽象使一切为之服务的工业统治权的平等化，被解放者本身最终就变成了黑格尔称之为启蒙的结果的‘部队’”。^①

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正是从这里原初地发生的，为了重新找回合理的理性，他开始思考哲学理论的现实性问题，而这个主题的发挥必然要进入到阿多诺一再强调的传统哲学的内在批判，这里的研究对象正是第一哲学与同一性思维。

^①〔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辩证法》，1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